

左

韬奋年谱 1933-

中卷

右

邹嘉骊 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韬奋年谱

中  
卷

1933—1937

韬奋基金会 韬奋著作编辑部  
邹嘉骊 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邹韬奋  
1895—1944



韬奋被迫出国前与家人摄于上海吕班路（今重庆南路）万宜坊寓所

1933年7月14日，韬奋登上意轮佛尔第号，被迫开始他的第一次流亡生活。



韬奋从国外回到上海，眼看国事危殆，立即以新的战斗姿态，经短期筹备，于1935年11月16日出版了《大众生活》周刊创刊号。



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全力声援“一二·九”运动。



这是被捕拘押于国民党政府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的七位救国会领导人，左起：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下图为史良。

韬奋在被囚禁的日子里，除了“出庭受审”，其余时间都专心致志的埋头著译。



## 目 录

|              |     |
|--------------|-----|
| 1933 年 ..... | 401 |
| 1934 年 ..... | 461 |
| 1935 年 ..... | 500 |
| 1936 年 ..... | 559 |
| 1937 年 ..... | 718 |

## 1933 年(39 岁)

◎1月1日,《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载《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新年特大号)。(全集第5卷第3—4页。)

◎《梦想的中国》摘要:“我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的社会,所谓‘共劳’,是人人都须为全体民众所需要的生产作一部分的劳动;不许有不劳而获的人;不许有一部分榨取另一部分劳力结果的人。所谓‘共享’,是人人在物质方面及精神方面都有平等的享受机会,不许有劳而不获的人。”“政府不是来统治人民的,却是为全体大众计划,执行及卫护全国共同生产及公平支配的总机关。在这个梦里,除只看见共劳共享的快乐的平等景象外,没有帝国主义者,没有军阀,没有官僚,没有资本家,没有男盗,没有女娼,当然更没有乞丐,连现在众所认为好东西的慈善机关及储蓄银行等等都不需要,因为用不着受人哀怜与施与,也用不着储蓄以备后患。”(第5卷第3页。)

◎1月7日,《一年一度的新年》、《民权保障同盟》、《木炭代汽油的发明》(以上三篇收入《小言论》第三集)、《漫笔》(收入《韬奋漫笔》,取题《怎样看书》)、《人生究竟》(收入《悬想》),载《生活》周刊第8卷第1期。(全集第5卷第534—536页、536—537页、538—539页、496—498页、394—398页。)

◎《一年一度的新年》摘要:“常人总喜欢在这新年里结束旧帐,开拓新机,怀着种种新的希望。不过这也要看什么人。”“例如我国关中一带的苦百姓,被当道逼缴‘烟款’的时候,带着手镣脚铐在大老爷堂上被杖责得惨呼痛号,未过年缴不出‘烟款’要挨打,过了年缴不出‘烟款’还是要挨打。又例如甘肃一带的老百姓吃树皮草根,十六七岁的大姑娘还没有裤子穿。未过年这班老百姓吃的是树皮草根,过了年这班老百姓吃的还不过是树皮草根。未过年这班大姑娘的裤子发生问题,过了年这班大姑娘的裤子还是不免要发生问题。总之过年这回事在他们是‘有若无’的,没有旧帐可以结

束,没有新途可以开拓,当然没有什么新希望可给他们怀着。此不过随手拈来,略举数例,此外大多数劳苦民众未过年是救死惟恐不赡,过了年还是救死惟恐不赡的,更不胜枚举。至于东北受不抵抗主义的恩赐,热血义民因反抗日帝国主义而死于非命的;闸北,吴淞,江湾,浏河,太仓一带,抵抗日帝国主义而牺牲的忠勇军士和无辜良民;较近在抚顺附近之千金堡,栗子沟,平顶山三村,暴日军队因探悉有大刀义勇军三人至平顶山探路,即将三村男女老幼三千余人,用机关枪扫射惨杀;凡此种在未过年以前,都已送了生命,都来不及过年了。”“要过个比较的心安意得的年,似乎是一个微乎其微的问题,但是也和民族的整个出路脱不了关系。民族的整个出路,在政治上的领导者能以大众的意旨为意旨,能以大众的力量为力量。”(第5卷第534—535页。)

◎《民权保障同盟》摘要:“据该同盟《宣言》所述,目的有三:(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并愿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我们从历史上看来,便知民权之获得保障,决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恩赐,乃全由民众努力奋斗争取得来的。”“不过依统治者的程度之高下,这种努力奋斗争取亦可有途径之分别。一种是用比较和平的方法,一种则为流血革命。前者为比较开明的统治者所容纳,后者则为冥顽不灵者所终必自招,所谓自掘坟墓者是。且就历史上的事实看,总是到前法用到山穷水尽,无路可走时,第二法不待敦请而自己应着环境的需要而强作不速之客。”“为中国计,我们当然希望该同盟的成功——希望之能否成为事实,那要看对象如何了。”(第5卷第536—537页。)

◎《怎样看书》摘要:“我们感觉到知识上的饥荒吗?只有下决心自动的努力于自修,永续的研究下去。一天如至少能勉强抽出时间看一小时的书,普通每小时能看二十页,一年便可看完三四百页一本的书二十几本,四五年便是百余本了,倘能勉强抽出两小时,那就要加倍了。记者最近正在编译《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最令我感动的是高尔基艰苦备尝中的无孔不钻的看书热”。“不过看书也要辨别什么书,有的书不但不能使人的思想进步,反而使人思想落伍!”“在这个言论思想自由的空调尽管唱得响彻云霄的年头儿,看书也有犯罪的可能,常语谓‘书中自有颜如玉’,如今‘书中’大

可引出‘铁窗风味’来！什么时候没有这种蛮不讲理的举动，便是什么时候望见了社会的曙光。”（第5卷第497—498页。）

◎《人生究竟》摘要：“在实际上个人和社会是分不开的，他的动机，他的行动，都是在社会环境中实际生活里所养成的。于此也许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为社会而生存呢？还是社会为个人而生存？”“个人要求生存，这是人类的本能，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依实际生活的经验，个人生存必于社会生存中求之，所以为社会求生存，就是为个人求生存，个人既脱离不了社会而做鲁滨逊，在实际上个人和社会即无法分开，既无法分开，个人生存和社会生存原是打成一片的，同时生存，说不出谁为着谁。不过个人不能不恃社会之生存而生存，社会却不因有一二个人或一部分个人的死亡而消灭”；“只有社会能给个人以力量，离开社会（假设有的话）的单独个人便无力量可言：所以可以说社会是超越个人的。‘从个人做出发点的人生观’，往往把自己看得比社会大，甚至幻想他是可以超社会而生活的，不知道只有在社会中活动的个人才有他的相当的力量，必须看准社会大势的正确趋向而努力的，才有相当的效果可得，那些‘自杀的自杀，腐化的腐化’就是对于这一点看不清楚；倘他能了解‘从社会做出发点的人生观’，便明白只有社会有力量，单独的一个人是没有力量的，只有在社会中积极活动的个人才有力量可言，自杀和腐化都是和‘在社会中积极活动’断绝关系的行为，决不是了解‘从社会做出发点的人生观’的人所愿做的。”“社会虽是超越个人的，但个人在社会的活动，对社会当然也有相当的影响。个人在社会里的贡献，一方面固靠社会各种联系的关系给他以力量，一方面也靠他自己学识经验眼光等等。倘若有人真是用他的能力来为大众谋福利，并非为他自己或其私党谋私利，而他的这种能力确比我大，我的能力确只配做他的‘垫脚石’——由这个‘垫脚石’走上社会大众幸福之路，不是做他个人私利的工具——那我也肯欣然充当这样的一块‘垫脚石’，而且只怕没得做！”（第5卷第396—398页。）

○1月9日，致杨杏佛信（全集未收），告知年费已交事。原信内容如下：“杏佛先生大鉴 接奉一月五日 来示 敬悉一切 本年会费三元遵嘱奉上 即请察收并 赐收据为荷 专复 敬颂 公绥 韬奋敬上 一月九日 附洋三元”。（上海韬奋纪念馆提供。）

○1月10日，《〈伏生国际论文集〉序》，收入3月出版的单行本。《〈徒然小说集〉序》，收入4月出版的单行本。（全集第5卷第4—5页、第

5—6页。)

◎《〈伏生国际论文集〉序》摘要：“伏生先生（注：指胡愈之）是我生平最佩服的一位朋友，他对于国际问题的研究，最善于用冷静的脑子，作客观的缜密的分析，这是在读者诸君自会感到的，我所尤觉得佩服的是无论怎样复杂的问题，一到了他的笔端，便能提纲挈领，左右逢源，说得你不懂也要懂，而且不但懂，还要不由自主的感觉到兴味盎然。”“一国中的人民能了解政治是怎样处理的愈多，政治当然更容易上轨道，或上了轨道而不至于脱轨。处于现在电气化的世界，交通便利，距离好像于无形中缩短了，一国政治的出路往往和国际形势脱不了关系，世界大势的了解和本国政治的了解便息息相关，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第5卷第5页。）

◎1月14日，《中国又多一处王道乐土》、《又一王道乐土的消息》（以上两篇收入《小言论》第三集）、《〈人生的认识〉按》（全集未收）、《第8卷第2期漫笔》、《不能两全》（收入《悬想》），载《生活》周刊第8卷第2期。（全集第5卷第539—540页、540—541页、7页、287—290页。）

◎《中国又多一处王道乐土》摘要：“中国承蒙日帝国主义的军阀的恩赐，又多一处‘王道乐土’了！”“山海关失陷之后，城内外大火，燃烧三日三夜，尸骸遍地，血腥狼藉，呻吟待死者不可胜数，日军藉口扫清战场，挨户搜查，浪人流氓，从而助虐，诬犯嫌疑，任意惨杀，对青年学生，仇视尤甚，死于非命者前仆后继，青年妇女，任被强奸轮奸，莫敢谁何。这种惨酷的遭遇，一部分同胞及身先受，实为全民族先尝苦楚，先被侮辱，时间虽有先后，祸难终将遍及，我们要为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祸福，团结全民族的力量，起而抗敌。”“问题全在手握国家大政者能否放大眼光，速决大计，勿为个人保实力，但为民族辟生路。”（第5卷第539—540页。）

◎《又一王道乐土的消息》摘要：“有友人某君新自东北来沪，一群朋友见着他，便围着殷殷询问关于已被日本在前年九一八攫去的那块‘王道乐土’的近况，他报告了许多事实，我现在要撮举一二转告读者。”“据说在这块‘王道乐土’里的中国人的生命财产，无时无刻不在日人任意支配中，即无时无刻不在危殆中，只要他觉得你有些微反日的嫌疑，尽管毫无证据可言，可以随随便便的结果了你的生命，由此含冤而死者无数。日人则叱咤风云，华人则朝不保夕，常常死得莫名其妙。”“有一个乡女进城，有几个日兵问她是哪一国人的，她脱口而出的说是中国人，被他们痛打耳光，这个乡女吓呆了，想起他们是日本兵，便改口说是日本人，不料他们打得更厉害了，说你

哪配做日本人！这个乡女最后只得说‘不是人’，他们才哄笑一阵，饶她一命。这是中国人在‘王道乐土’中所受的侮辱的一斑——也许就是‘王道’的待遇吧！”“这位朋友说，在沈阳的西侨舆论，固不直日人的暴行，但有的西报社评却认为日人固然野蛮，但对付中国民族却只配用这种野蛮的手段；并谓日人的暴行，任何西方国民均不能忍受，而中国人却能忍受，所以该受！我们听了这样的论调，作何感想？”（第5卷第540—541页。）

《〈人生的认识〉按》全文摘录：“新生先生以债务债权的关系作譬喻，来说明不平等社会的实况，颇为有趣，但我却要补充一些意思：就是这种说法不过是就一时的现状说，我以为不平等的社会制度根本改造之后，因技术一天一天的进步，科学代替人力的地方愈多愈巧，人人都可以渐渐的少作工，多享福，果能平等，享用尽管十二万分的舒服，谁也无需还什么‘债务’！人生不是为还债而来的，享福只须在平等制度之下，不能算欠债，也更无还债之可言。罪不在享福，乃在不平等的享福。”（《生活》周刊第8卷第2期。）

◎《不能两全》摘要：“教育和职业不能两全”，“这个问题的解决，似乎不外两个方式：一是彻底的解决，那只有到‘社会制度根本改造’以后才有可能性；一是迁就环境的暂时的办法，那只有就各个人的可能范围内，分别求得比较认为最大限度的结果。关于第一种方式，很显然的，不平等的经济制度之打破，不平等的教育制度之推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之铲除，而代以平等的经济，教育，社会制度，这都是和这个社会的改造发生密切的关联，势不能由一二或少数私人所能于急促间完成的。除此彻底的方式之外，只有第二种的方式可供酌采了，能勉强入校求学的人校求学——或由家人相助筹划，或由本人寻得工读机会——无从勉强入校求学而又不能把耗费白米的嘴巴暂搁不用，只有寻业。能寻得合于本人心意兴趣的业，固属幸事；否则只得暂时栖止，同时注意于自己能力的逐渐增进与较佳的相当机会之利用。如并此而不可能，即虽肯如此刻苦努力而在社会方面仍是报以‘此路不通’，这种现象如仅占社会中极小部分，仅闻嗟叹愤慨不平之声，等到陷入此境者日多，则社会中所蕴蓄的无可忍耐的不平的意识愈广且锐，那便是种下革命种子，客观各条件具备之后，旧社会之崩溃有如摧枯拉朽，新社会之勃兴便似怒涛狂澜之沛然莫之能御了。在这种状况之下，求学与就业的难问题，便不是少数人的问题，也不是少数人所能求到彻底解决的问题，乃是社会的问题，须从总解决中求得附属问题的解决了。”（第5卷第288—289页。）

○1月17日,下午4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在上海亚尔培路331号(今陕西南路147号)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主持,韬奋担任会议记录,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陈彬和、胡愈之、鲁迅等九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了分会章程和拟发表的宣言。在酝酿成立团体的过程中,宋庆龄进行过一连串个别邀请的活动。宋庆龄邀请蔡元培、杨杏佛,蔡元培、杨杏佛邀请鲁迅,鲁迅邀请胡愈之,胡愈之邀请邹韬奋……。当时,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胡愈之有事通过周建人与鲁迅联系。一天,鲁迅托周建人邀请胡愈之去中央研究分院开会,叫胡愈之再邀请邹韬奋参加。这是邹韬奋第一次参加一个正式的“组织”。据邹韬奋后来回忆:“当时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在上海,开会时总是和上海分会开联席会议。每次参加者有蔡先生、孙夫人,她的英文秘书史默得莱女士,鲁迅、林语堂、杨杏佛、胡愈之诸先生,我也忝陪末座。”(1933年1月18日《申报》、胡愈之《我的回忆》第24页、全集第10卷第831页、《中国民权保障同盟》26页、全集第5卷第12页。)

○1月21日,《不便发表下的管见》、《幸免心理所得的反应》(以上两篇收入《小言论》第三集)、《学校与商场》(收入《悬想》),载《生活》周刊第8卷第3期。(全集第5卷第542—543页、543—544页、290—293页。)

○《不便发表下的管见》摘要:“我们这班‘阿斗’所惴惴不安者,自九一八以来,‘镇静’迄今,沈阳失后继以锦州,锦州失后继以黑龙江,黑龙江失后继以山海关,山海关失后九门口又在岌岌可危之中了,恐将‘继’着下去的还有热河和平津,依照田中政策,‘继’的地方尚多,‘继’的日期正长。讲抵抗,则马占山、苏炳文以及淞沪十九路军之自动抗敌,局部应战,或以援绝弹尽而忍痛退却,或以援兵过迟而力竭声嘶,责任何在,至今未明。此次榆关之战,最初仍奉令不准开枪,直至军士见敌迈进而愤激不能再抑制,始自动开枪还击。此种事实,各报均有详载,早成公开秘密,记者非有意于国难方殷,犹作诘难之辞,惟愿前愆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倘所谓‘军机’,所谓‘内容’,在事实上的表现,仍不外乎但求幸免的心理,缺乏整个的计划,虽有少数忠勇奋发的将官军士在前敌作殊死战,为民族争回几分人格,但无主宰,无联络,无增援,徒成为敌人所‘各个击破’的各个‘孤军’而已。他人以整个计划,全国力量,侵略我土地,断绝我民族生路,而我们却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忌疾讳莫如深,对内勇于对外,这是何等惨痛的现象!”(第5卷第542—543页。)

◎《幸免心理所得的反应》摘要：“我国应付国难的方针有吗？有！在文电上所宣布的，当然是说得天花乱坠，在事实上所表现的是怯懦，怯懦的背景是始终抱着幸免的心理。这种心理的具体表现是以平日高唱打倒帝国主义的中国，竟始终死心塌地专想依赖帝国主义的集团——国联——就是后来明知国联决无靠的希望，所谓‘要人’也者，也还是口口声声说国联必能替我国主持公道。其先国联还唱着‘空城计’，挂羊头卖狗肉，据最近的形势，索性在‘城楼上’下令欢迎‘司马懿’，索性把‘羊头’抛掉，老老实实的公开‘卖狗肉’了。”“中国向国联乞怜，国联并未把中国看在眼里，已极明显。”“日本不但要国联默认她掠夺东北的行为，而且还要承认她的行为正当——即须承认伪组织非出于日本之首创。此外要求‘直接交涉’，在她是自以为看透了我国只有望屈服的一条路上跑的，所以斤斤于‘直接交涉’，有恃无恐。国联之必始终迁就日本，这是摆在眼前的，我国自己作何打算呢？”（第5卷第543—544页。）

◎《学校与商场》摘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事物，无往而不商品化，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上的上层建筑之一的教育，当然也免不了商品化的弊病。商品化的结果，最显著的有两种现象：一种是非有孔方兄的随伴，休想受教育；还有一种是因为畸形社会制度之内在的矛盾，受了教育也往往得不到出路。”“我们倘注意在人类文化历程上的教育之历史，便知道教育的最初起源实为帮助生活，其作用只是用以维持生活的手段，人人既须生活，即人人须受教育，受教育原不是一件希罕或特殊高贵的事情，到了教育‘商品化’之后，教育乃成为和孔方兄发生特殊关系的人所独占。”“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教育的生产’和同一制度下的‘商品生产’有类似的地方，都是盲目的大量生产，都跑到‘生产过剩’的路上去。”“在这种状况之下的青年，受不到教育的固不免烦闷，因为不得入路；受到了教育的也不免烦闷，因为不得出路。这是畸形教育的社会制度破绽的现象。”“教育不能离开政治经济而独立存在的，是要受制于经济的关系（同时也就是政治制度的关系），而为某种经济的社会的副产物，某种经济的社会的形态之反映，‘要把现代的教育制度根本改革一下’诚然重要，但决不是请几个所谓专家改学制或课程所能解决的，乃是整个的社会制度问题中之一部分，要和社会制度连带解决的，不是教育一个部门所能单独解决的。”（第5卷第292—293页。）

○1月22日，《社会新闻》第2卷第8期，署名“傭”者著文恶意攻击民权保障同盟是利用在野各党派，是一群“灰色动物”，诬蔑韬奋是国家主义

方面的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79页。)

◎1月28日,《为国捐躯的安营长及士兵》、《自援式的逃命》(以上两篇收入《小言论》第三集)、《〈欧游杂感(下)〉按》、《读〈淞沪血战回忆录〉》、《〈变了什么花样?〉附言》,载《生活》周刊第8卷第4期。(全集第5卷第544—545页、546—547页、8—9页、9—10页、11—16页。)

◎《为国捐躯的安营长及士兵》摘要:“榆关抗敌血战,以南门之战为犹激烈,守南门的安德馨营长,奋勇杀敌,苦战一昼夜,负伤临阵,敌冲进时,率众三百人与敌肉搏,全营殉难。”“据安营长的阿兄德明谈,说他的弟弟于国难严重时期,即将家眷送往故乡,以备尽忠于国,后又致函家中,谓外侮日亟,我已准备为国守土,置生死于度外,家中诸事可请大哥(即安德明)负责照管云云。”“又据上海回教同人接北方电报告安氏抗敌经过,谓于日军寻衅时,曾对他的士兵说:‘我安某一日在山海关,日人一日决不能过去,日人欲过去,只有在我们的尸骨上过去。’”“于此可见安营长为国殉难,早具决心。”“这种为民族争生存而奋斗的牺牲精神,我们后死者应该含泪承受,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我们所沉痛悲愤者,倘我国果有整个的抗敌计划,通盘的联络布置,以安营长及其部属的忠勇奋发,所得结果,必不仅此。此次榆关抗战,将官因奉令不准使事态扩大,有碍交涉(?),不准开枪还击,敌部爬城进攻,只掷砖石,后敌猛攻前进,才于愤激中开枪抗御,此中戎机,已有出入。又据北来通讯,当敌方援兵涌入,炮火最烈之时,我方守兵不但无法换班进膳,即补充子弹,亦不可能,可见布置单薄,原无充分准备。在这种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而士兵犹能百折不回,死守不去,从容就义,尤令人闻之泣下,而所以致诸将士于如此环境中效死者,其责任何在,我们愿于愤慨哀痛之于,提出一问!”(第5卷第544—545页。)

◎《自援式的逃命》摘要:“在此国难日迫,听说北平有大学校的学生向学校当局要求提前放假,停止考试,作‘自援式的逃命’,很引起各方面的愤慨责难。”“这种怯懦的自私的表现,我们诚无法为这班青年辩护,但是,记者却不因此而走到绝对的悲观方面去,至少有两个理由:(一)这种行为不是可以代表全部分青年的心理。”“据一月十四日《申报》北平电讯,燕京大学即有一部分学生于当日赴热河参加抗日工作,又谓该校女生亦将赴热,参加救护工作,现正为前方将士缝制棉衣;又二十三日该报北平电讯,说‘清华制造烟幕弹成功,定明晨全体参加工作’。可见他们也不尽是‘逃命’专家!”“(二)怕死是人类本能,淞沪抗日血战中,日军降兵有叩头求饶一命

的,说中国人一定比外国人怕死,殊不尽然。只须有真能有计划有决心有真诚信仰而为民族奋斗努力领导的中心力量,必定有多数人自愿抛却身家性命一同向着前程迈进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代,不顾九死一生的革命活动,不是青年肩负的吗?同是中国的青年,何前勇而后懦?无他,领导的中心力量有勇懦而已。”(第5卷第546—547页。)

◎《读〈淞沪血战回忆录〉》摘要:“淞沪抗日血战,为八十年来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最光荣之一战,记述的书虽有过好几本,但内容精警,文笔流畅,这书要算是首屈一指了。全书的精彩,要让读者自己去领会,记者现在仅想介绍两点:第一是该书尤其令人难忘的几句话;第二是当时忠勇战士视死如归的一斑。”(第5卷第9—10页。)

◎《〈变了什么花样?〉附言》摘要:“《生活》除公开发表的‘立场’和主张外,并未曾‘变了什么花样’。”“这是记者第一次参加一个正式的‘组织’(注: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但是这个‘组织’和任何政党的性质不同,乃以一般的民权为努力的对象,参加的人并不致因此失却他原有的立场和主张,也就是不致于‘变了什么花样’。这个组织的重要发起人是宋庆龄女士和蔡子民先生,虽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党员,但他们却不是以党的立场来发起这个组织。”“此种组织至少可在可能范围内揭发不依法律手续而用秘密手段摧残民权的行为,由此唤起当道及社会的注意。”“关于‘协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一切奋斗’,亦列在该‘同盟’目的之一,我们在‘言论’‘出版’方面努力的人倘仍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似乎亦有些说不过去”。“此事既与‘言论自由’及‘出版自由’有关,和本刊的事业也有相当的关系,所以记者参加,也还不脱离以本刊事业为中心的意思。”“记者虽认为此事不无尝试的价值(究竟将来能尝试出什么成绩来,尚不可知),并不存什么奢望”。“我们就事论事,对于应该严厉制裁的事情,不妨严厉的责备;对于应该积极鼓励的事情,也不妨竭诚赞许,就此事的发起动机及为公道而努力的精神而论,我们对于此事的发起人为着此事表示佩服,似乎不能算为逾分的事情。”“记者深信中国要得救,要走上轨道,决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负得起这个使命的,必须有一个组织严密,计划周详,真心为民族前途大众福利而努力奋斗的集团,领导全国民众共同奋斗,才能负得起这个重大的使命。我对此点深信不疑,同时默观静察,感觉到一般人痛心疾首于党派的心理之深刻,不禁发生无限的感喟。但是这种心理既有事实上的背景,凭空要希望这种心理的改变是不可能的,必须在事实上有了改变,然后才能引起民众的信任

心。”“已有的政党如不注意这一点,终必没落;未来的或正在酝酿的政党如不注意这一点,也必蹈覆辙,这是决然无疑的。”(第5卷第12—16页。)

◎1月,《小言论》第二集由生活书店上海初版。收入邹韬奋发表在《生活》周刊上的“小言论”139篇(注:全集少收一篇《一党专政与一党专利》),卷首刊有弁言《本书付印时的几句话》(1932年12月7日作)(全集第5卷第19—210页。)

◎《本书付印时的几句话》摘要:“由寒松先生汇集自六卷廿七期至七卷四十五期,即自廿年六月至廿一年十一月间的‘小言论’,略加选择删除,复经作者略加审阅,再删去数篇,成此第二辑。”“(一)……作者自己和自己作前后的比较,自觉思想上的方向日趋坚定,读者于前后各文中或亦可以看出一二,为是为非,师友间颇有不同的意见,倘蒙读者不吝指教,不胜感幸。”“(二)自九一八,尤其是一二八以后的拙作,对于抗日救国的文字特多,这是认为民族自救乃目前的要图,决无意于提倡狭隘的国家主义。作者相信现阶段内的我国革命,须考量国中的特殊情形,应暂以中国民族为本位;但相信革命的最后目标,是世界各民族平等自由的结合,而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第5卷第19—20页。)

◎2月1日,下午,和宋庆龄、蔡元培、林语堂等以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在华安大厦八楼举行记者招待会,就顾祝同非法枪杀《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的事件,要求新闻界发表宣言,敦促南京政府严办顾祝同。上海各报记者四十余人出席。蔡元培主持会议,并宣读民权保障同盟宣言。“宣言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迅将顾祝同及其他有关系负责人员免职,并依法惩办。二,公布顾祝同所认为‘宣传共产’的《江声日报》副刊所刊载诸文。三,切实保障民权,务使以后不致再有此种同类之事发生。宋庆龄作了即席发言,主张由上海报界领导全国新闻界罢工一日,以示坚决抗议。蔡元培建议报界应对刘案发表宣言,俾彰真理。史量才表示,这一案件跟报界有切身利害关系,他愿提请日报公会进行讨论。邹韬奋等也主张全国报界对顾祝同的暴行应一致表示抗议。”(《申报》1933年2月2日、陈漱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42页。)

◎2月3日,《生活》周刊作者蔡文星1月11日病逝,其姊蔡慕晖到周刊社晤谈,韬奋“详悉文星女士的生平”,著文《悼念蔡文星女士》。(全集第5卷第212—214页。)

◎2月4日,《江声日报》经理刘煜生被枪决案》、《新闻记者》(以上两